

東方叢刊

2009. 1

- 中华美学学会
-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
-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联合主办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期刊

主编 麦永雄

东方文化 / 东方美学 / 东方文论 / 东方文学 / 比较诗学 / 比较文学

东方丛刊

李义林题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期刊

2009.1

中华美学学会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联合主办

主编 麦永雄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丛刊. 2009 年. 第 1 辑 / 麦永雄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633-8323-8

I. 东… II. 麦… III. 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320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金山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750 册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东方丛刊》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季羨林 贺祥麟

特约编委

丁 帆 王 杰

叶 朗 乐黛云

刘纲纪 刘中树

朱立元 吴元迈

饶芃子 郭齐勇

钱中文 黄宝生

童庆炳 曹顺庆

董晓萍 曾繁仁

编委

王德明 孙建元

麦永雄 张明非

张利群 肖启明

何林夏 胡大雷

莫其逊 黄伟林

覃德清 雷 锐

目 录

比较诗学

杨乃乔	主持人语:多元文化研究的“大通”视域及对学术山寨文化的抵抗 (2)
刘耘华	比较诗学的本土生成 (8)
徐志啸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比较诗学价值 (25)
王柏华	中国诗学中的身体隐喻 (36)
钟厚涛	场域生成与话语规训 ——论先秦子学时代的勃兴及其对文学阐释思想的导向 (46)
林光华	比较视域下的意象论及诗歌特征论 (63)
姜 哲	意象组合与抒情结构 ——中西诗学视域下的《喧哗与骚动》研究 (83)
颜 琪	《圣经》中的爱与自然:一个主题学的考察 (99)

古典新绎

张震英	论中国古典诗歌流派观念的演进	(113)
黄水云	论历代博弈赋及其时代内蕴	(124)
翟景运	南朝皇族与吴声西曲的创作与传播	(145)
杨柏岭	自由的经典象征:唐宋词中渔父系列形象的特点及其意义	(159)
陆德海	林纾文法思想对桐城家法的坚持与突破	(179)

文化传媒与理论研究

黄鸣奋	新媒体艺术理论的起源	(196)
梅琼林	论网络写作的“超位性”及其对写作主体的审美重塑	(212)

中国现当代文学探索

乔以钢	西绪弗斯式的悖谬	
刘 莹	——张洁新时期创作中的女性观	(227)
周根红	文化症候与《收获》的影视趣味	(241)
陈绪石	都市怀春:现代海派情欲小说的民族性景观 ...	(253)

主持人杨乃乔教授简介

杨乃乔,男,1955年生于北京,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台湾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获中国古典文学方向硕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方向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获比较文学方向博士后资格证书;曾赴香港、美国、日本、新西兰、中国台湾等高校讲学与访学;出版专著译著多部,如《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元散曲详注》(合著,百花洲出版社)、《后殖民批评》(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比较文学概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被教育部选为研究生指定教材,2004年获北京市教委精品教材奖,2006年被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2007年获上海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学苑出版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主编,商务印书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乐黛云教授七十华诞纪念特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与《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纯学理性研究文章一百多篇,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东西方比较诗学的本体论研究”等。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及相关中西文论研究。

主持人语： 多元文化研究的“大通”视域及对 学术山寨文化的抵抗

◎ 杨乃乔

如果说，学科边界消失意味着学科的死亡，不如说，这是一个当下知识跨界向多元领域膨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既有的学科意识，完成学科观念的转型，否则，我们就可能被定义为后数码时代的学科原教旨主义者与学科新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知识跨界的膨胀对无可逃避于全球化时代的每一位学者来说，是他们当下必须遭遇且接受的学术文化扩张态势，这种扩张态势是国际学界最大的敞开与幸运。在 21 世纪的后数码时代，知识结构及研究视域的单向度学者将彻底地沦落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贫困者和学术信仰的受难者。文学研究的本土主义为什么被文学研究的世界主义潜移默化地替换，这是当下学术研究发展无视个别学者的固守及学术的旧日情感所呈现出来的总体趋势，对任何一位学者而言，无论赞同或承认与否，均是如此。这也意味着比较文学研

究的再度崛起。

但需要不断澄清的是,比较文学一定不是“文学比较”,在这里我们什么也不“比较”,只是在谨慎地沉淀、颐养与获有一种国际化的汇通性学术研究眼光,这种汇通性学术研究眼光就是一种在学术修辞上隐喻的比较视域——“comparative perspective”;所以我们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以比较视域为学科安身立命的本体,在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中进行互动、互见的国际性学术研究的学科,由于这个学科的安身立命在于研究主体的定位,因此用旧日的学科边界意识在历史的客体时空中为其划定一方存在的领地,这是过去及当下比较文学界的最大不幸。

2008年10月我在北京连续参加3个国际学术会议: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主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语言大学承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主办的“‘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3个国际学术会议正是在学科敞开的无边界状态下,云集了来自海内外不同国家、民族与地域的多学科的学者,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陈述着不同的话题,他们沉浸在这些源自于不同文化区域的不同话题中思考着,寻找着共同的思想交集及思想交集之外的差异性文化元素。

其实,这种学术思考的路数已获有比较文学研究的性质。

加亚特里·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在《一个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一书的起始处,就描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在国际多元文化主义的大潮中向文化研究转型的趋势:“从1992年以来,在柏林墙倒塌后三年,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正处在自我的革新中。这大概就是回应崛起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①台湾大学外语系的张汉良教授在复旦大学讲学时,也提及他在海外作为上一代的

比较文学研究者,不断地受到海外年轻一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挑战:我们已经走向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学研究时代,我们不再把自己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称之为比较文学研究,而称之为文化研究什么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起用其他的学术指称为其命名,不称其为比较文学研究什么的;但是,无论比较文学的命名作为能指可以怎样的替换,其学科的所指本质是不变的。如果在当下找不到适合这一学科的更恰如其分的命名时,我们建议还是尊重已被使用了一百多年的这个学科的命名——比较文学。

的确,当下学科研究的边界在逐渐消失,在《一个学科的死亡》一书中,加亚特里·C. 斯皮瓦克指明了比较文学研究在学科边界的消失中走向涅槃,但是,这部著作的命题总是被仅从汉语字面上提取意义的学者所误读:比较文学因学科边界的消失而走向死亡。实际上,比较文学恰恰因学科边界的消失而走向开放的新生。无论如何,在后数码工业文明的信息爆炸时代,学界更热衷于需求学术知识的博学之士,而不再是一孔窥豹的所谓专家。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博士”这个术语在历史上出现很早,其文化身份大约在于掌管图书资料且通古今知识以备咨询,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2),开始设置五经博士。“博”本是一个形声字,从十,尊声。许慎《说文》释义言:“博,大通也。从十,尊。尊,布也,亦声。”^②“十”是“博”字的意符,是其本义所在,许慎《说文》释义言:“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凡十之属皆从十。”^③从文字的释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把博士定义为知识“大通”的博学者,当然在历史的代际更替中,“博士”作为书写的符号是一个滑动的能指,但无论怎样替换其所指的知识分子,我们从“博士”这一字面上依然可以获取“知识大通的博学者”这样一个基本意义。但事与愿违,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博士”作为一个能

指且所指的知识分子,他们知识结构的沉淀与形成在潜移默化中从知识大通的博士向知识定向的专家生成且跌落。当然导致这一跌落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学科划分得过细,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学科划分得过细。

关于“专”的解释,《周易·系辞上》在对“乾”卦的诠释中已经涉及:“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④韩康伯在此注言:“专,专一也。”^⑤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言:“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于经业。”^⑥沈约在《到著作省表》一文中更是较早地使用“专家”这个术语的:“臣艺不博古,学谢专家,乏怀铅之志,惭梦肠之术。”^⑦从博士到专家,这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或当下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其知识结构蜕变的历程,“博”与“专”在两个反训的意义上应该成就两类古代文人或两类当下知识分子——博士与专家,但博士的培养其实不啻如此。实际上,不只是汉语学术文化传统中发生过从博士到专家的蜕变,放大地来看,在过去到当下的国际学术界也曾多少重复着这样一种让人尴尬的现象。

实际上,从博士向专家生成的势态发展到21世纪,博士的培养着实打造了一批在知识与学术心理两个维度上可能跌向因知识专一而形成学术人格封闭的专家,知识结构的封闭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学术人格的封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博士在本质上不再是知识大通的博学者,而是一位一旦跨出自己狭小的学术领地且所知不多的专家,并且这类专家对其他学科持有一种不理解的自负心理,或持有一种不愿意理解而不是不理解的封闭心态。学术是天下公器,最可怕的就是,一位自负的专家以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及其价值观判断或描述其周边学术界的其他学科与学者,并因其不同于自己的学术判断及学术价值观给出否定性的学术定位。当然,当下最需要警惕与抵抗的就是学界的山寨文化现象:如居一方边缘狭小之域,在学缘的宗法制中拉一批学术血亲关系,推出一位学术寨主,

在草莽意识中对本为贵族身份的学术给予模仿、拼凑、组装、换版与贴牌,以此打造一方抢占与强占学术山头的学术山寨文化,并且佯装学术贵族,在短期的炒作中获取学术资源的暴利,再把学术资源的暴利和学术官僚杂混在一起,制造一批学术垃圾,最终生成了中国学界的学术山寨文化主义。

我们无意在这里做文字游戏,只是想说明,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科系统从前工业文明时期的建立,到其开始大规模崛起后走向学科边界的严格分野,再到现代工业文明时期学科在系统中的分野作为一种学科成熟的标志,终于在后现代数码工业文明的资讯爆炸时代,学科系统的边界被文化资讯的大爆炸夷平为一种迫不得已敞开的状态。令人欣悦的是,这种迫不得已的单向学科系统破坏及敞开状态,迅速地被国际学术界前沿的精英者及学术人格敞开的知识分子营造为一种科际整合的自觉,因此出现了“inter-disciplinary”这个术语,此后诸种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日新月异崛起,且吸纳着如此众多在心态与视野两个维度敞开之学者云集于此,上述在 2008 年 10 月北京召开的 3 个国际会议就是如此,说到底,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如此。

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元素加强,在《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一文中,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艾田伯(René Etiemble)指出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元素加强,其必然使比较文学向比较诗学生成:“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认为它们自己是直接相对立的,而事实上,它们必须相互补充,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ry)。”^⑧其实,比较诗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崛起与生成,在呈现的一瞬间,便获有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切品质,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的跨学科与跨文化思考是比较诗学的

特质;因此,在这里我们集中了7篇来自于不同思考维度的比较诗学文章,让7位学者栖居一方共同的学术平台,以其不同的理论思考在这里形成理论思想的交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又曰:“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氏族,衣服饭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⑥这7篇文章不一定是优秀的关于比较诗学的言谈,但把其整合于此的学理目的也就在于此。

说到底,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需要一种国际性的多元文化“大通”视域,放大了来讲,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必然如此,也必须如此。

-
- ① [美]加亚特里·C. 斯皮瓦克,《一个学科的死亡》(Gayatri C.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 ②③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89、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经韵楼藏版。
- ④⑤ 王弼撰,韩康伯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78、78页,见于《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上册。
- ⑥⑨ 颜之推撰:《颜氏家训·勉学》,15、18页,《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8卷。
- ⑦ 沈约:《到著作省表》,294页,严可均辑:《全梁文》,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⑧ [法]雷纳·艾田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René Etiemble,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见于雷纳·艾田伯:《比较文学的危机》(René Etiemble,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54)按:英文译本原文如下:“By combining the two methods which consider themselves diametrically opposed but which, in fact, must complement each other—the historical inquiry and the critical or aesthetic refle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uld then be irresistibly drawn towards comparative poetry.”这里的“comparative poetry”应该译成“comparative poetics”。

比较诗学的本土生成

◎ 刘耘华

比较诗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自 70 年代起,它被先后引入中国学界。由于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着规模宏大、影响深刻的中外异质文化交流与碰撞事实,其中包含了广泛的诗学内容,因此在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比较视阈下所进行的诗学比较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下面,我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中国比较诗学的本土生成、理论内涵和方法论贡献。

一、从“格义”到“况义”:中西互释的本位嬗变

佛教初入中国之时,其独有名理概念,很难为当时士人所理解,故传教僧徒采用中国固有学说来阐述,这种做法就是“格义”。即《高僧传·法竺雅》所云“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①。所谓“外书”,主要是指儒家和道家的典籍,故通过“格义”所比附的对

象,包括儒、道两方面的内容。前者如以“五戒”(戒杀、盗、淫、妄言、饮酒)比附“五常”(仁义礼智信),以“三归”(佛、法、僧)比附君子之“三畏”;后者如以“空”比附“无”,以“种智之体”比附“太虚”^②,等等。有时,中国固有观念被直接移入佛教“经典”,即,“格义”被提前运用到“印度”的文献之中了,如智者大师《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引提谓波利问佛之言及佛之答言,便是典型一例:

提谓波利等问佛:何不为我说四六戒?佛答:五者,天下之大数。在天即五星,在地即五岳,在人为五脏,在阴阳为五行,在王为五帝,在世为五德,在色为五色,在法为五戒。以不杀配东方,东方是木,木主于仁,仁以养生为义。不盗配北方,北方是水,水主于智,智者不盗为义。不邪淫配西方,西方是金,金主于义,有义者不邪淫。不饮酒配南方,南方是火,火主于礼,礼防于失也。以不妄语配中央,中央是土,土主于信,妄语之人乖角两头,不契中正。中正以不偏乖为义也。^③

陈寅恪先生称“格义”之法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④,认为“‘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自北宋以后援儒入佛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谓融通一类者,亦莫非‘格义’之流也。即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之疏《孟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之变相也”^⑤。

西来学说初入中土之时,“格义”常表现为以“中”释“西”,以“求同”取代“别异”,其主要功用是接引异域新知、减轻本土阻碍;待到时日久长,根基一旦稳固,“别异”便自然要乘势而起,以取代“认同”的地位。这时,“格义”就往往要求以“西”释“中”,即通过重新解释

固有文化以输入全新外来观念。这种“格义”就是“况义”。

“况义”的名称来自明末耶稣会士与中国信徒共同翻译的《况义》一书。此书共译出伊索寓言 22 则，每则寓言的前一部分为“故事”，后一部分为“义曰”。如《三友之交》说：

有人于此，三友与交。甲綦密，乙綦疏，而丙哉疏密之间，大氏犹戚之也。此人行贪秽，事主不忠，上诏逮之。急惶遽求援，念吾最密之友，逢人见爱，权动公卿，请与偕往。曰：急难相拯，实在友矣。友曰：尔所往远而险，我艰步趋，可奈何？尔时罪人，深懊恨。自以生平密交，如是如是，更向谁怜？沉于渊者，不问所持，则姑向丙家友叩请。丙家友曰：我未便与俱也。但谊不可失，相将至郭外而反。此人回思，悲念无复之矣。异日者交疏友生，又何敢告？是友翻来慰劳曰：而勿忧，而还从我可，不失望也。彼二友者，不能同往，往亦不能救若。我且先若后来，能令主上赦若罪。若立功，复若旧宠矣。

义曰：世人之所急爱厚密，财货金宝等也。次者，妻子亲朋也。最轻薄而交疏，则德功是矣。人者获罪于天，死候迫之。货财安能俱？其妻子亲友，哀送蒿里而回。惟此功德，永守尔神，祈天保佑。世之人，莫与为友。何也？^⑥

明末谢懋明在《况义·跋》中曾询问张赓“况”为何意：“况之为况何取？先生曰：盖言比也。……罕譬而喻，能使读者迁善远罪。”^⑦“义曰”之例，既类似中国史书中的“太史公曰”、“赞曰”，又糅合了伊索寓言原有的讽喻意味，它所包含的旨意主要有两重：一是代表作者的思想立场，二是表明此“义”乃公正确切之见，即所谓“义者，宜也”之意。金尼阁与张赓借寓言所传达的是天主教的神学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认为，这种观念乃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合宜之见。所

以,他们对待儒学的方略是:如果儒学与之一致,则“格义”而求其“同”(本土学者视为“附儒”);如果儒学与之不一致,则“况义”以别其“异”。如上引寓言,即敢于立足于神学立场,否定人间功业及血缘伦理。这种以“西”释“中”的意图,谢懋明在《况义·跋》中说得十分清楚:“张先生悯世人之懵懵也,取西海金公口授之旨,而讽切之。复指其意所在,多方开陈之。颜之曰况义。夫义者,宜也;义者,意也。师其意矣,复知其义。虽偶比一事,触一物,皆可得悟。况于讽说之昭昭者乎?然则余之与先生,先生之与世人,其于所谓义一也。何必况义,何必不况义者哉!后有读者取其意而悟之,其于先生立言之旨矣。”^⑧

总之,“格义”以附会本土观念为主,以接引外来思想为辅;“况义”则以外来思想为主位,切割本土资源以为己用。二者据以互证互释的本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要指明的是,以求同为主旨的“格义”与以别异为主旨的“况义”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不过,不管是佛教还是天主教,一旦在中土(哪怕是暂时)站稳脚跟,便必然要表明它们与中土固有学说不同甚至优越的一面,并进一步发挥它们“补儒/道”或者“超儒/道”的功用。

二、禅宗与“比较诗学”

“格义”和“况义”是古代以宗教传播为介质的中西文化相互交往与会通的主要方式,但其内涵集中在哲学、宗教和伦理学的层面,很少涉及美学与艺术理论。佛教东传,对中国的文艺创作影响深远,然而其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禅宗来实现的。

禅宗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可择要概述为五方面:

其一,诗话著述的产生与禅门语录的流传有密切关联。欧阳修